

（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往事非烟】	广西文革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应	
	——读程郁、秦晖文革回忆有感	高 潮
【劫后反思】	梦醒温都尔汗	林小仲
【难忘岁月】	恐怖的等待	马云龙
【书刊评论】	大力推荐杨继绳先生新著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胡 平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往事非烟】

广西文革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应——读程郁、秦晖文革回忆有感

· 高 潮 ·

一

广西文化大革命，以血腥杀戮震惊中外。2009年我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罗克汉普顿的山顶公园与家人出游时，遇上一英国游客。交谈中，他知我们来自广州，便谈起当年他在香港亲眼见到广西文革大屠杀中丧生者的尸体从珠江口内源源不断地流到香港海域一带的情景。四十多年前的他国事，这位老外记忆犹新，话语中流露出的惊恐神情，仿如事发当前，显得异常强烈。其实，我本人就亲历了那场大屠杀的，并在“解放区”出来“投降”的路上，我和同校（南宁四中）的老教师吴肯，差点被同校的政治教师、联指武斗一个片的“指挥官”，一个叫海滨的人的拉出枪杀。是年我刚30出头，现已过古稀，作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40多年前那场派性斗争“获胜”一方大开杀戒，滥杀对立派群众的风腥血雨的日子，横尸遍地和血流成河的惨景，不但终未遗忘，而且有着一种愈来愈强烈的愿意，要把这段经历诉诸于文，公诸于世。作为历史学的工作者，多年以来，我也有打算对有关广西文革大屠杀这一课题进行客观理性的研究，冀求为社会提供点历史启迪，让人们时时警惕防止文革在中国重演，并以此慰藉在广西文革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成千上万民众在天之灵。

二

最近，读到两篇有关广西文革回忆文章，一是程郁的《我眼中的广西文革》（《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另一是秦晖的《沉重的浪漫——我的红卫兵时代》（徐友渔：《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

这是两篇有关少年时代的广西文革回忆录。

程郁当年是十一岁的小学生，随母亲在1968年武斗时逃离“联指”一方控制的单位大院中的家，躲入“422”派占据的南宁旧城区部份街区——解放路一带。在“422”的“解放区”被“联指”和解放军武装包围和攻占的过程中，小小年纪的程郁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然后是举起双手当了“战俘”，与妈妈一起被关进所谓“收容所”的集中营长达数月。回到单位大院的家中，可怜的小程郁又在备受歧视中生活，因为她妈妈是“牛鬼蛇神”，受到管制批斗。程郁以流畅平实的行文诉说了一个小女孩在广西文革大屠杀中身心受尽折磨的经历，读起来催人泪下。我的一位学生告诉我，她是含着眼泪读完程郁文章的。程郁在文中提到妈妈的同事陈广旭，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到广西不久就遭遇文革，仅仅因为是“422”的成员，从解放路出来时被就地枪杀，事后单位领导对他的生与死从不加以过问，结论也没有一个。一个有为青年，学有所成，刚踏入社会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程郁至今仍痛惜不已，而对当权者漠视生命的冷血，更是令她难以释怀。程郁说到当年，老师以公开宣判枪决“反共救国团分子”的人数为例子对学生进行遣词造句的语文教学，把杀人的血腥带进课堂，在轻松愉快的“教学”气氛中，有意无意中用杀人为乐的邪恶思想，去荼毒那些年少无知者的心灵。对于这罪恶的一课，程郁说，“我没笑，这个造句令我终身难忘”。辨别人性善恶的是非准则和关爱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程郁经受过血与火洗礼的幼小心灵中已深深扎根了。为此，程郁教授的《我眼中的广西文革》中，远远不是诉说苦难的咏叹调，更是一首旋律高亢的人道主义奏鸣曲。程郁还回忆起，当年大屠杀刚过，学校组织参观被炮火摧毁的解放路城区，老师按照当权的杀戮者编造的政治谎言，把被杀戮者污为杀人放火“十恶不赦”之徒。谎言在亲历者面前，掩盖不了真相，但却可以蒙骗无数不知情的善良百姓，并对我们后代贻害无穷。程郁教授，坚守一个人文学科工作者应有的社会良知和历史责任感，在呼唤着当年的成年亲历者起来捍卫记忆，为民族的未来，还原历史真相。

其实，我就是程郁文中所提到的成年亲历者之一，与她妈妈一样，为逃避武斗灾难，从被“联指”占为武斗据点的学校到解放路暂住，“被俘”后，辗转关押，最后被关在“重犯”嫌疑人的广西区交通学校。押回南宁四中后，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我断断续续地遭到长达数年之久的批斗和管制。程郁的呼吁，令我感到不能再迟疑了，下了决心把自己酝酿多年的想法加以实现。从这篇《广西文革大屠杀的幸存者的回应》一文开始，不断地做下去。

秦晖，现在是清华大学的知名教授，文革当年是南宁四中的初一新生。我们是同校的师生，也同是“422”派的“四中革联”成员。他在《沉重的浪漫——我的红卫兵时代》中叙述的南宁四中文革的简略过程，又是我亲历的；而他回忆当年投入文革的心路历程，也与我们多数的老师学生，投入弱势的“422”派的思想动机大致相同。当年，我却不认识秦晖，近年来常见他的名字出现在有关学术网站，为此，隐约觉得秦晖应是位有成就的学者，直到最近读到了他的此文，方知这位当年南宁四中的学生已成为了享有相当知名度的清华教授。我一方面为当年不认识的学生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更令我欣慰的是，秦晖是南宁四中学生中撰写有关四中文革历史的第一人。

### 三

南宁四中，广西南宁文革中的重灾区。由于从1967年初起，就有广西军区派驻的阵容庞大的军训团长期进驻，另外就是秦晖所说，学生中的干部子弟多，其实高中部还有一定数量郊区农民子弟，所以，为军训团支撑的“联指”人数在师生中占优势。“四中革联”从成立开始到最后覆灭，都是处于弱势之中，武斗时在校园无法立足，四散回家或外地。在武斗中，南宁四中又是“联指”的一个重要据点，联指的武斗专业队伍进驻其中，四中的“联指”组织“三七”兵团拥有相当的武器装备，其中一政治教师海滨还充当了联指一个片的武

斗指挥官。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表现得相当凶残，毫无人性可言。所以，南宁四中是全市在大屠杀中死人最多的学校之一。其中二位青年教师被枪杀，他两人与我们一样在解放路躲避武斗，1968年8月5日早上从解放路出来“投降”，一位是俄语老师覃连光，他比我们先走一步，以后就再没有见过他。后来听说，当时他被人抓到邕江边枪杀后，尸体推落了江中。另一位是语文老师霍普罗。当时我们是一起出来“投降”的，我们从解放路一步入新华街，在水塔脚下，就被我校“三七”的学生抓住，这几个武装的学生，是高二的，我没有上过他们的课，叫不出名字，他们要我们几个人（吴肯夫妇、我还有霍普罗）跪下，用绳子把我们串缚起来，赶我们往前走，他们便继续冲入解放路去找“四中革联”的学生。我们几人走至民生路广州照相馆前，遇到了海滨。他手中有五四式手枪，胸前还挂着冲锋枪，他先用手枪重重地敲击我的头部，我头上立即血流如注，随后他走开了，当我们行到市政府门口的马路时，有一个武装人员过来剪开串缚我们的绳子，带走了吴肯夫人彭国英（她是广西中医专科学校的老师），我们三人重回被俘人员的队伍，与大家一样跪地等候上“囚车”。这时突然枪声大作，后来听说是联指在广州照相馆对面的废墟上枪杀了20多个被俘的“四二二”人员，枪声过后不久，海滨又出现，他站在被俘人员队伍旁边，高声喊叫我和吴肯、霍普罗三人的名字，要我们出来。同时，队伍中的人群开始骚动，大家都往队伍中间挤迫，以逃避联指人员拉出枪杀，霍普罗因而与我和吴肯老师冲散了，也就此与我们永别了。后来听说当时海滨点名时他站起来出列了，就在路边被人枪杀，冲锋枪朝他背部打了四发子弹，胸部的鲜血象涌泉般喷出，倒地后又被手枪补了三枪。当时，我与吴老师虽不知霍老师死得那样惨，但被海滨点了名，也觉得在劫难逃了，便开始吩咐“后事”，我们对挤迫在人群前面的“南宁教工井冈山”成员、秀田小学老师梁绍建说了各人的家庭地址，请她以后设法把我们的消息告诉家人，梁老师顿时泪流满面地边听边点头答应。海滨也终于发现了我们两人，喝令我们站起来，正要拉我们出队伍之时，在这生死一刻，市政府里冲出五个解放军，把海滨赶走了，我们总算是死里逃生了。

今年初，原来南宁市“教工井冈山”的难友数人聚会，梁绍建老师也在其中。他们打电话给我，互相问好，我与梁老师自68年几乎是生死之别后，四十多年没谋面了，我在电话中问她还记得那时的事吗，她说，那里会忘记呀。前几年，我们四中当年的同事蔡爱梅老师与先生从温州来广州，我们几个调回广州的四中老师与蔡老师夫妇在海珠区滨江路的中海名都茶楼聚会，我与她也是四十年未见面了，我谈到当时险死于海滨枪口之下一事时，她先生说，他正是五个解放军中的一人。他说，那时他在广西军区政治部，攻打解放路时，他被派驻市政府中，广州照相馆前的集体杀俘事发生后，他马上电话向军区司令韩世福报告，韩世福命令他们立即制止杀俘，当他与几个解放军匆匆走出市政府大门时，刚好看见海滨正要强拉我们的一幕，是他们赶走了海滨。天下之事无巧不成书，当日不相识的救命恩人竟是同事的先生，而四十多年后又偶然相会。我当即向蔡老师的先生救命之恩深表谢意，谈到当年大屠杀和死难的覃连光、霍普罗两老师，大家都唏嘘不已。蔡爱梅老师，当年是部队家属，当然是“联指”的成员，但她是一位秉性善良的好人，极赋同情心，她为人呀，是有口皆碑的。我们原来“四中革联”部分老师与远在温州老家的蔡老师至今尚有联系往来。吴肯老师当年大难不死自有后福，现已94岁高龄，退休三十多年，在家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且80高龄后，还与同校曾长灏老师，云游四海，遍访祖国的名山大川，东上长白山，观天池的烟雾，西出塞外，揽天山的美景，美不胜收，每每与他通电话，话筒传来洪钟般声音和爽朗的笑声，令人感到欣慰，我祝他百岁有期。

海滨此人，解放初期参军，曾在广州军区长治政治学校工作，转业回广西后，先在广西体工学校教书，后调武鸣壮文学校，东调西调的，终未能谋个一官半职，资格虽老而长期不得志，文革前不久才调到我们学校，也是当个普通老师，与我同在政治教研组，大家相处尚可以，他还多次对我的政治进步表示关心，当然出于何种动机就不得而知了。其实，我与他共事时间不长，因1966年初我便离开学校，到郊区农村参加四清了。文革中，我与他也

几乎不见面，更没有过任何的正面过节。吴肯老师更与他没有任何私人交往。我们这些与他毫无私仇的人，他都想横加杀害，我至今都想不出其中的真实原因。不过海滨为人凶狠则是学校众人所公认的，文革期间，因买饭票的一点小事，他给驼背的残疾人、学校饭堂管理员张发权，猛抽了几巴掌。还有一次，是海滨调离四中但仍住在学校里时，也是为小事，又动手打一老师的儿子，该老师报警，派出所要拘留他，他竟然在该老师家中跪地求饶，结果他还是被行政拘留十天。可见，他的凶残本性是不假。直到今天，我每每回想起1968年8月5日那天所遭遇的情形，总隐约觉得，南宁四中“联指”一些师生曾密谋，利用攻打解放路的机会，杀光在“解放区”内四中的教师学生的。

“文革”中，还有一位教务处的老职员失踪（此人听说解放前是托派的中央委员，解放初接受中共的统战召唤，从香港回到广西，被安排在南宁四中教务处当职员，平日从不多事，待人友善，是个安份的单身汉）。多名学生死于武斗或被俘后杀害。

文革大屠杀后，海滨、人事干事黄某某、语文老师黄某某等“联指”头目把持的校革委会，对教职员工的政治迫害也是相当残酷，曾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先后达四五十人之多。按“三结合”要求，担任校革委副主任的原党支部书记文行恕也被他们迫走。我们的老校长黄代铭说过，“三黄一海”（一黄姓干事、另一黄姓的教师、工友黄某某、还有海滨）四中之祸，黄校长说得再正确不过了。

顺便在这提一下，文革中，文书记是“联指”观点，而黄校长则靠边站，但与我们参加“四二二”的教工，一直保持良好关系，文革后，常有往来。我们“四中革联”有几位移居香港的老师，每回南宁都不忘去探访我们两位老领导。而两位老领导于我本人，可是有知遇之恩，我毕业后分配到南宁四中任教，一直得到他们的多方关怀和培养，令我终身难忘。

1983年“处遗”前后，海滨和与他狼狈为奸的黄姓人事干事，偷偷地开溜了，不敢再在四中工作。黄干事此人是复员兵，“文革”中也是坏事做尽，他的不齿所为，至今仍为人数落，如滥用人事工作职权，给“盾牌兵”泄露教工的档案材料，令不少教工受迫害。我本人也是黄干事“抛档案”的受害者之一，文革初期，我一直在出版社得置身于学校“盾牌兵”的“红色恐怖”之外，黄干事大概是不甘心我在外“逍遥”，把我在广州高中毕业时的整团交心材料全部内容，以某某战斗队署名的大字报贴出，以煽动“盾牌兵”揪我回校。但不知何故，“盾牌兵”，对他大字报不加理睬，我便仍在外“逍遥”。他除了对教工进行种种政治陷害外，竟然还借此勒索一些老教师钱财，有一老师被他强夺了金戒指一只，另一老师被迫“借给”他一笔钱。“处遗”中，这两位老师告发了他，他不得不灰溜溜地上门给人赔礼道歉，至于钱财是否归还就不清楚了。其实，被他趁火打劫，勒索钱财的老师远不止两位，人家不去追究，只为懒得再与此等下作之人打交道而已。听说，海滨在“处遗”中在广西农学院受了处分。后来，这两个四中“文革恶人”鬼使神差的，又住同一间中学的宿舍，两人也先后中风，先是海滨瘫痪在床，接着是黄干事跟上，也瘫痪不起，真是一双难兄难弟也。四中的旧同事一说起海黄两人生不如死的惨状，却是无人报以同情而是说“活该”。

军训团从进驻学校的开始就支持“盾牌红卫兵”。“盾牌兵”在文革初期，由于干部子弟和部份所谓的工农子弟的“红五类”学生，效法北京奉行“血统论”的“老红卫兵”组织而成立。他们要把学校的“旧传统”彻底打破，他们的头子在师生大会中声色俱厉地宣告，以后不准用“师生”一词，只能用“生师”。他们对老师进行种种毫无人性的迫害，团委书记杨永安等一批老师被他们关进“牛鬼蛇神窝”，“窝”的门口横拉一条离地面十几公分的绳子，门口的地板上铺满石灰，被关押的老师出入都要象狗一样在绳下爬行，弄得一脸和上一身的灰白，看守的“盾牌兵”便以此取乐。团委书记杨永安老师不甘受辱，跨绳而出，结果招来了一轮毒打。“盾牌兵”的施暴还殃及教工家属。我曾在往市郊的公共汽车上，见到

三位在学校饭堂做临工的教工家属挑着满桶大粪，被骑着自行车的“盾牌兵”用鞭子驱赶往农村分校的方向走，只见她们稍放慢脚步，就遭到重重的鞭打，从位于市中心的学校到郊区的分校，路程有十七八公里之遥，在烈日暴晒下，挑重担，不停地被驱赶着疾走，这种非人的残酷劳役，就象是史书上所述的奴隶社会的奴隶主把奴隶当作牲畜一样折磨的重演。后来听说这三位家属是被当时学校主管人事档案的职员污陷为“逃亡地主婆”，才招来了这番灾祸的。“盾牌兵”还在全校以班为单位开展对出身不好的“黑七类”的学生的批判。出身不好的学生要一个个在会上站立起来，自报家庭成分，接受批判。有的盾牌兵还到同班同学家中进行抄家，以乘机掠夺私财，他们有的人除翻箱倒笼外，竟强迫同学的母亲脱光裤子上下跳动，以为这招可以让藏在私处的金器掉出，一无所获后，恼羞成怒，骑在同学母亲背上拳打脚踢。当时，这种卑劣下流的行为不是个案，“红五类”在“破四旧”中比比皆是。

1967年初，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北京的“联动”被取缔。在南宁四中，以赤裸裸的“血统论”为护身符的“盾牌兵”随之瓦解。但军训团驻校后，在军训团的支持下，“盾牌兵”的成员又重新集结，组成所谓的“三七”兵团。军训团对受“盾牌兵”迫害的师生却实行打压。“盾牌兵”奉行的“血统论”变成了军训团的“革命的阶级路线”。由此，以反动“血统论”纠合起来的“三七兵团”，在南宁四中横行肆虐一时。当时，“三七”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可以随意殴打伤害“被管制”的教职工以及学生，老校长黄代铭差点就被当作死于武斗的“三七烈士”的陪葬品；语文教师陈名三（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的妹夫、抗战时期的广西地下党党员），被几个“三七”学生拉到教室，用气枪射击胯部要害处，差点丧命；语文老教师李干才，被一“三七”的学生拳打脚踢，毒打足足一个多钟头，打至严重内伤。事后李老师说，他是那个学生的班主任，曾因偷东西被他批评教育。这完全是挟私报复的恶行。李老师被打时，该学生迫我现场观看，我记得该生是瘦高个子，为我校隔壁的区邮电管理局的干部职工子弟。我离开广西前，李老师内伤复发，备受病痛折磨，不久即离世了。“四中革联”的同学刘少平在大屠杀后自觉回校，却遭到“三七”兵的毒打并强灌墨水。“三七兵”此类令人发指的暴行多不胜数。

“四中革联”就是在这种政治压迫中产生的，是受“血统论”和所谓“革命的阶级路线”迫害的师生的反抗组织。我本人在文革初，从郊区农村的“四清工作队”，抽调到广西区党委的文化系统的文革工作队，进驻广西人民出版社，直到1967年初才回到南宁四中。刘少奇派文革工作队，被毛泽东批判为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我在厅处级干部充塞的区党委文革工作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但也觉得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要“幡然悔改”，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面来。回到四中之初，有一次我参加了部分师生举行的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议。会上揭露了有关“盾牌兵”种种行径。但会后的第二天，军训团团长却是公开表态，指责这个控诉会是反动的黑会。我对军训团长的态度为之一不解，为受害者抱不平，进而促使我义无反顾加入了他们的抗争行列。由于受“盾牌兵”“不准革命”的伤害，秦晖回忆说“对‘特权阶层’抱有反感，又没有高贵血统的我，便成了四中革联的一般成员”，“我对四中革联的热情则更多地有了‘正义冲动’的成分”。又如至今一直为秦晖所深深敬重和怀念的“四中革联”领导人之一的喻崇东同学而言，他曾是“盾牌兵”的一员，行为也相当过激，军训团进校后，他完全可以成为“三七”兵团的头面人物，但“盾牌兵”的残酷，使他回归人性，加入受害者的群体，并被推举为“四中革联”的领导人，最后为争取被迫害者的政治平等而献出了年青的生命。1968年8月，我与革联的同学王孟奇（现是上海大学美术教授）在区文化大院收容站相遇，被关在一起。当时王孟奇同学告诉我们，8月6日，他与喻崇东同学一起被俘，喻崇东被一联指的武斗人员当场枪杀。前几年，我在南宁一墓园偶然发现喻崇东的衣冠墓，我将墓碑拍摄下来，并通知了当年革联的学生徐毓坤。他是印尼归侨，刚从澳大利亚回南宁暂住，便组织了几十位当年革联成员，专程到喻崇东墓前举行悼念仪式。事后，他们把悼词和悼念场面的相片寄给了我。在这我把悼词中的大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喻崇东同学是湖北武汉人，生于一九四八年。早年就读于南宁桃源路小学，中学就读于南宁四中，逝世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享年二十岁。

喻崇东同学生前曾任南宁四中高廿四班班长。他以思想进步，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特别是乐于助人而被誉为雷锋式的人物。“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所展现出来的口才、文才、非凡的组织能力、远见卓识以及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忘我牺牲精神，使我们这些活着的同龄人每每想起都为之叹服不已。非常不幸的是：他的才干和年轻宝贵的生命，在十年动乱之中被过早地葬送。我们深为失去一个好战友、好同学而万分悲痛，更为国家失去一位潜在的人才而痛心。”

“三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是非成败转头空，哀思依旧在。尽管喻崇东同学曾经舍命为之奋斗的“事业”已被证明不过是一场悲剧，但这仍然不能抹杀他生命中的光辉点。作为曾经与喻崇东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和同学，我们可以证明和告慰喻崇东的亲人，他不愧为父母的好儿子，我们的好同学和好榜样。

当年兵荒马乱之际，兴宁路、新华街等几条主要街道的大部分商店的商品都被洗劫一空，唯独我们驻守的百货大楼里的各种商品完好无损，柜台和仓库都贴有封条，国家的财产得到妥善的保护。这与喻崇东以身作则，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格管理是密不可分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晚至六日凌晨，是我们被困的全体师生面临生与死考验的最后紧急关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喻崇东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召集了全体师生（四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并作出了自己参加突围，其余师生跟随居民群众出走的二项重要决定。他在临别前深情地对我们说：‘你们出去以后，就把一切事情的责任都推到我这个当头头的身上，你们不会有事的，你们一定要活下去……’并逐个与我们拥抱道别……”

“今天，当这些尘封了三十六年之久的历史事实被披露出来的时候，相信大家都会对喻崇东同学油然而产生敬意。一个年仅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居然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惊人之举！而正是这种惊人之举，避免了更多的生灵遭无辜涂炭。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最后谱写了一曲凡事处处为他人利益着想的雷锋精神之歌。

喻崇东同学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不愧为一位德才兼备、正直勇敢、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杰出青年。他的为人，他的才干，他的思想品德乃至他的音容笑貌，无不散发出一股感人的人格魅力。如果不是派性的原因，他当堪称为危难时刻舍己救人的英雄！而在我们心目中，他其实就是一位英雄！为什么在他与世长辞三十六年后的今天，大家仍然从四面八方赶来在他的衣冠墓前凭吊？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十六年过去了，同学们对喻崇东同学，由衷敬佩之心情不减，怀念痛惜之哀思长存。我想，秦晖在这三十六年中和当年革联的同学不会有联系，但忆起喻崇东，心情同样是敬重和痛惜，并不约而同地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喻崇东同学的怀念。坦荡无悔忆当年，生死情谊今仍在，“四中革联”的“正义冲动”的精神纽带使之然也。其实，与喻崇东同学同时遇难的，还有吕予机和蒋达园同学，他俩都是一身正气的年青人，想起他们，我无限伤感。

在这里，我作个比较，当时“三七兵团”有位“知名”领导人金某人，可能是“功高卓著”吧，文革后期留校搞专案，还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多年，“处遗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被调到他校任教师。前年，几个学生从南宁来广州，我们聚会中，谈到这位当年的“三七”名人，刚好其中一学生亲戚的孩子在此人任教的中学就读，学生们问他以前在那毕业和任教，他竟说自己刚从新疆调广西不久，我们听了，哄堂大笑。想来他也实在可怜，昔日“文革的辉煌”成了今日见不得人的所为了，那尴尬人生，他何时了呀。

#### 四

程郁的文章，人性的情怀寓于叙事中。秦晖文章则以夹叙夹议见长，在文中，他把个人的经历与对“四中革联”的兴衰和“广西四二二”的流变的分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条不紊的加以叙述，试图从社会学的学理层面，开拓广西文革史研究的新视角。秦晖文中的有关观点，我基本认同，并以一己之见略作补充。

##### （一）

但就广西文革中的两大派而言，就正如秦晖所言，“无疑，正如80年代的‘处遗’结论所说，当时的两大派都是‘极左’思潮下的‘造反派’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别可以忽略。”秦晖所言极对，我认为了解广西文革两大派之区别，是我们认识广西文革历史真相和剖析广西文革大屠杀根源的出发点之一。

我们知道，广西文革两大派的分化对立是在1967年上半年，但其形成演变却是渊源于1966年下半年文革发动时期。1966年6月，广西和全国一样，全民造反，官有官造反，百姓有百姓造反，对文革的对象，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则是官有官的解读，百姓有百姓的解读，百姓中不同社会群体又各有各的解读。历次政治运动官从来就是唱主角，只有官整民，而无民反官。而文革，则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百姓竟然被伟大领袖“钦准”反官。当然，官不会甘于被民反，他们宁可“抗旨”，仍要唱整人的主角。当时，广西最大的官韦国清则是如此，他掌控着党政大权，拥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培养出来的各级政治骨干队伍。他就是利用了这些强大的政治资源，抢先造反，一反“走资派”，抛出了他的下属，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广西日报》总编辑钟林等作为广西最大的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代表人物，发动全自治区批判斗争，充当他的替罪羊；二反“反动学术权威”，他指令大专院校派的代表到广州听陶铸的文革动员报告，各大专院校停课造反，在高校把大批学者教授打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批斗，加以残酷迫害。此外，在中学，他则放纵干部子弟等“红五类”的学生对老师乱批乱斗，施以百般侮辱和伤害。为此，要说当年广西文革造反派的第一人，韦国清是受之无愧的。可是，此人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之流，对敢于造他的反的或不甘于在他控制下造反的群众，则是打击倍加。其中最重要一招就是派出阵容庞大的文革工作队进驻高校和区直文化系统各单位，抢占文革的前沿阵地，依靠各学校和各单位中的原有政治骨干队伍，直接对那些不听话的“造反派”实行打压。

本人当时从郊区“四清”工作队，调到广西中医专科学校的文革工作队，随即再调区直文化系统文革工作队。文革工作队的总部设在区文化大院，总部的领导多是厅级高干，我记得的一位是区化工厅厅长何子健，还有一位是区党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张黎敏（宣传部副部长贺亦然的夫人）。我由总部分配在广西人民出版社文革工作小组。我们这个组组长是自治区人民银行副行长、老八路路明，其他的成员，除了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外，都是区直机关有相当职务的干部，如区银行的处长徐桂林（新四军时期的老革命）、科长傅云龙、区党委农办的处长章罗、后来又增派了一批区党校理论教员章英等和部队干部，如6966师部政治部的一宣传科长。在我们进驻之前，出版社内两派的斗争已相当的激烈。一派是“不听话”造反派，清一色的党外群众，多是青年编辑人员，我记得其中就有著名的画家刘宇一，还有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毛水清和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袁广达，他们思想激进，能言善辩，要“自主造反”；另一派则是听话的“造反派”，由出版社党组织依靠的政治骨干队伍组成，以党员为主，其中有编辑人员，但是以党政干部居多，他们坚持的是“反右”斗争的思路，认为文革的发动是又一次“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并自认要站稳政治立场，按区党委的要求行事。当然，这两对立派都把社长曾霞初作为走资派揪出进行批斗，而社的

党组书记区某人则是“听话派”的重要人物。曾霞初“靠边站”后，天天早上在大院中扫地，他是个慈眉善目的长者，有时与他遇上，我都上前与他聊几句。我们文革工作小组进驻后，全面接管出版社的领导工作，依靠“听话的”以对付“不听话的”，并调来出版社的人事档案，了解“不听话者”们过去的政治表现，或许是打算从中挖掘1957年的“漏网右派”以作“秋后算帐”之用吧。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出版社文革工作小组解散，但因区文化系统文革工作队总部继续保留，我们小组的章罗、傅云龙和我等三人调回总部工作，而我则作为总部的联络员继续留在出版社，直到1966年年底。联络员是不参与社内文革活动的，但要与“听话”派保持密切联系，并要密切注意“不听话”派的动向，及时向总部汇报。说白了，我这个联络员实在是个“间谍”的角色，我前前后后收集的“情报”记录了七八个厚厚的小本子。可能是我提供的“情报”有价值吧，总部要我协助章罗和傅云龙整理成系统的材料向区党委汇报，用当时文革的语言来说，这是见不得人“黑材料”。

我的文革工作队的亲历，见证了文革伊始广西政治裂变的产生仍源于韦国清把参与文革的群众分为“听话的”与“不听话的”，给前者扶持，对后者打压，以后广西“联指”和“四二二”两大造反派对立的形成也由此而萌发。

1966年8月，中共中央文革《十六条》的出台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公开，广西与全国一样，形势骤变，“革命造反”由学校等文教系统蔓延到党政机关、工厂企业、街道等各行各业，并突破单位藩篱冲向社会，造反狂潮席卷全广西，到处都在肆意揪斗“牛鬼蛇神”和“走资派”，这些疯狂的造反派，以后在两派中皆有之。当时，韦国清不但控制不了局势，连他本人都未能免受“戴高帽”、“挂黑牌”之辱，特别是当时一部份造反派揪住他的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不放，并要清算他主政广西多年的错误。

在疯狂造反之中，派性组织纷然群起，派性斗争激烈展开。从现在看来，当年的所谓派性组织，实质上是不同社会政治群体的一种特殊的组合形式，而派性斗争则是在所谓观点之争掩盖之下，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在争夺合法的政治资源方面的斗争。

我们知道，我国在文革前，一贯以阶级斗争理念为治国之本，国民之社会地位的高低和政治经济利益享有的多寡均以阶级出身和政治身份为基本依据，社会被撕裂，形成种种对立的社会群体。

第一种类是工农阶级、革命干部及其家属子弟等，这一政治群体在文革中自称为“红五类”，平时他们享有种种政治的特权，如就业升学、提干当官、入党参军，以及与这些关联的实际利益，他们的精英是党政官员和以党团员为主的政治骨干队伍，而所谓的政治骨干又多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养成的，所以政治运动是这些人施展“政治才华”的最好时光，他们可以靠整人积聚政治本钱，获得升迁和入党入团受到重用，所以“搞运动”是他们的特长，更是他们的“专利”，绝不允许其他群体指染的。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初师毕业后一直在党团部门任职，每逢政治运动都被抽调在“运动办”工作，他曾戏言自嘲，平生一无长技，干部履历表“特长”栏，要不是空白，就只能填“搞运动”。开放改革之初，周扬因提倡人道主义精神被胡乔木、邓力群打击，因而大彻大悟，与同在文革中九死一生的陆定一，谈及他们文革前主持的中宣部的工作时说，就是“整人”两字可以概括。

另一社会群体是在中国特色的“种姓制度”中最低等级的“首陀罗”，他们当中有完全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分子，还有相当多的的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以及上述各种分子的子弟和亲属。这一社会群



体在文革中被污以“黑七类”的恶名。平时，这些人被剥夺了好多应有的社会权益，并不许“乱说乱动”，在政治运动中，则是当然的“运动员”，只有挨整的资格，而没有任何申辩的权利，而他们的子弟在政治上被歧视，前途一片灰暗。这种中国的“首陀罗”还被“世袭”，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永无出头之日。

还有一种不红也不黑的“灰色”群体，是些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他们对“红五类”的优越社会地位既羡慕又妒忌，又庆幸自己没有沦落到“黑七类”一样的田地。平时，他们做人处事，谨小慎微，只求无过不求有功，苟且人生，运动临头，胆战心惊，总怕一觉醒来被推落“黑七类”的深渊。他们当中多数对“黑七类”之处境虽有所同情，但却时时记住划清界线，为恐沾边，而其中一些品行不良者则是见风使舵，百般钻营，充当打手，以求捞点政治油水，这种面目可憎的小人，本人可谓屡见不鲜，尤其在文革之中。

文革前，中国社会这种政治生态及其流变，已成为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定势格局了，无人认为是可以改变的。但文革开始，高调提倡“反潮流”的伟大领袖却出人意料地一改政治运动的传统定势，“恩赐”了全体百姓（当然，被专政的“四类分子”除外）一个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暂短机会，号召百姓大造党政官员的反。这样，一向备受政治歧视、种种社会权益受剥夺的平民百姓和中国式的“首陀罗”（印度的种姓制度中的第四等级，贱民也）们的子弟便趁机蜂拥而起，在大造党内走资派之中，以表达要争取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益的诉求，并通过建立派性组织以集合力量，与不准他们造反并一向在政治上打压他们的““红五类”抗衡。而那些一向以“搞运动整人”视为其“专利”的政治骨干们和自视高贵的“红五类”子弟，更是不能容忍“黑七类”的“贱民翻天”，指染他们的政治特权，为了维护既得政治利益，他们同样联合起来，也打着造反的旗号，建立了有大批党政官员作后台的、更为有系统的派性组织。所以，在当时派性山头林立，形形色色的派性组织聚散无序、分合无常的此起彼伏过程中，实际上是以上两股政治势力在搏奕中的分化和组合，代表享有政治特权的既得利益社会群体的广西“联指”和代表在政治上一向受歧视和被打压的社会群体的“四二二”两大派的雏形也在这其中逐渐显露分明了。经过“一月夺权”的厮杀，两派对立终成定局，并在争夺《广西日报》的控制权的短兵相接中，两大派的总指挥部正式产生，各自亮旗竖帜。一方是“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改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四二二”；另一方为“五二五革命行动指挥部”，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

## （二）

“联指”骨干力量，由各级党政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原有的政治骨干，就是如上面所提到的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听话”的造反派一类组成，而其领导核心则是由自治区党委的一些干部担当，如区党委组织部的廖炜雄等。另外，“联指”已不象文革初期的“盾牌兵”和“赤卫队”等保守派组织那样讲究成员的出身成份了，连那些过去他们不屑一顾的出身不好或本身有多少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都拉拢入派，以壮大派组织。在派性斗争发展到武斗阶段后，“联指”拥有的各行业的相当庞大的武斗专业队伍，以南宁为例，如南宁的“建司”、“汽司”、南宁人印厂和糖纸厂的民兵高炮连，还有街道青年的“沥血兵”等（以凶残著称的“沥血兵”在1967年七、八月左右，曾在南宁市和平桥一带的铁桥头集市抢掠商贩时，对人群开枪扫射，当场打死无辜市民七人，死者的遗体曾在新华街“造反楼”侧门的人行道陈放，这是我当时所亲见的），广大农村的民兵更是“联指”可以随时调动入城参加武斗的后备武装。“联指”虽为群众派性组织，但其武斗专业队费用和武斗“军费”支出，全是动用国家财力物力以支撑，并有广西军区和六九六六部队（原广西地方的独立师）以佯装“抢枪”的形式，源源不断地供给各种轻重武器。文革时期的群众派性组织，象广西“联指”那样，发展为全区（全省）规模，而又与地方各级原有的党政系统、后来的各级军管小

组、革筹小组、革命委员会等浑然成一体，实行有效的统一的指挥和调动的，这个全国各省是绝无仅有的。广西文革的大屠杀就是“联指”当中的一些头头和武斗干将——韦国清的“党卫军”去加以实施的。这些人挥舞着屠刀，踏着被他们杀害的群众的尸体堆成的阶梯往上爬，在文革后期盘踞了各级革委会和党政机关的要职。

“联指”还是当时文革的当权者韦国清等迫害部份党政领导干部的得力打手，对所谓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有历史问题的、还有支持“四二二”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管制批判和所谓审查，就是由联指的骨干分子去执行，手段也是相当残酷。1968年在血洗“四二二”后，便开始对曾表态支持过“四二二”的领导干部伍晋南等进行疯狂的报复。如对被污为所谓“伍修集团”主要成员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原区党委的领导人用武装押送到全自治区八个专区、四个市、三十多个县内进行“巡回大游斗”，时间长达五个多月之久，先后批斗四十九场，参加批斗的人数达三百三十多万人次，被陪斗的县以上的干部达一千七百多人。我们知道“批斗”是历来的政治运动的整人手段，“文革”中更是滥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方，但象广西那样，对一批级别相当高的省厅级而年老体弱的老干部实行长达半年之久惨无人道的身心摧残，则是空前未有的。实施这一暴行的，虽是当时由原“联指”的头头、骨干充塞的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但绝对是经韦国清首肯同意的。韦国清是老红军，当年随红七军转战到江西中央苏区时，正是王明的“左倾”统治时期。红军和党内部的酷烈斗争及其对革命事业的祸害，韦国清不是不知的，几十年后，他竟以长时间大规模的“巡回大游斗”的新发明，把当年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手段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1969年又借“清理阶级队伍”之机，对文革前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大规模的迫害，如“广西地下党案”、区直的武鸣学习班等（从1970年到1973年在广西武鸣县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由，将区直单位一百多名厅局级干部实行关押，进行审查，实行变相劳改），都有庞大的专案人员队伍，其成员除了少数部队人员外，大部分是原来“联指”的头子和骨干人物，这些人以“有功之臣”自居，个个心态卑劣，手段卑鄙，企图把受审查的老干部统统打下去，以取而代之。1934年入党的老革命、区人委秘书长兼区党委统战部部长的林克武在回忆武鸣“学习班”时说当时“某最高管理人员找我谈话，说我是走资派是完了的，没有什么可幻想的，要在这里劳动改造。将来取得宽大，翻身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林克武提及的“武鸣学习班”的最高管理人员某人只能是原“联指”的重要人物。我有一高中同学，在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是“联指”的积极者，就曾对我炫耀，她当过“武鸣学习班”的专案人员。当时，她说这番话时，文革时期还没结束。

### （三）

广西“四二二”则完全是自发的群众派性组织的组合。其中有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学生，还有文教事业单位和党政部门一些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上面提到的广西人民出版社的“不听话”的造反派就属此列，他们虽多是非党团员，但也不乏“根正苗红”的。这些政治热情有余而缺乏政治实践年青人，是从正面去解读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的目的和意义的，他们认为伟大领袖号召整党内走资派，主政广西多年的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是不能置之例外的，同样应接受群众揭发批评，他们造区党委和韦国清的反，是革命行动，是捍卫伟大领袖的革命路线的体现。这些造反派的激进分子在伟大领袖提出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下，对压制群众运动而死不肯公开认错的韦国清揪住不放，穷追猛打。当时，我在区直文化革命工作队总部，就听说在处理桂林事件中，韦国清获知“桂林老多”等造反派要抓他游斗的消息，便连夜乘车逃离，但终被“老多”途中追赶堵截，“押回”桂林游斗。总部人员，上上下下，包括我本人，对“桂林老多”的所为感到义愤填膺，有人当场就高叫，以后非算账不可。

这些“不听话”的造反派，颠覆了历来政治运动“官整民”的传统，大受无权无势的平民子弟青睐，也为受尽政治歧视的“黑七类”子弟们所亲近，他们当中有胆量起来造反的，

不少人都加入了“四二二”。另外，“四二二”还有从“听话”的造反派“倒戈”的，如我们南宁四中革联的领袖人物，上面提到的喻崇东也曾是“盾牌兵”，还有俄语老师覃连光，中共党员、出身孤儿，曾当选为南宁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真正的红五类了，1967年两派武斗开始后，他对我说，对两派群众自相残杀很想不通，要离开南宁，随后去了梧州那边，投奔远亲，但1968年大屠杀中，他遇害，听说是我们学校的联指某人把他拉到江边枪杀的。还有曾与我一样当过人民出版社文革工作队队员的章英、李延龄等后来都加入了“四二二”，他们两人都是自治区党校的教员。章英还是我1964年在党校中教班学习时的班主任，是一位一表人才的理论教员，1968年初，章英在四二二总部担当要职，大屠杀后，被关进了看守所，文革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广西华侨补校当领导，我离开广西前曾专程去探望过这位老师、工作队同事、“四二二”难友。李延龄年纪与我相近，是广西西林的少数民族子弟，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也是“红五类”，是个正直善良的人，在人民出版社时，我们关系很要好，他回党校后，我曾多次去看他，当时他的孩子刚出世。他加入“四二二”后，在1968年中央最后一次接见广西两派时，他是“四二二”的赴京代表之一，和我一样，经历磨难，文革后分配到自治区农科院，不幸患鼻咽癌，英年早逝。

1966年底、1967年初，工人起来造反，以熊一军为首的“南宁工总”是“四二二”的发起组织之一。文革前，所谓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只是个空洞的政治概念，领导权的拥有者是党政官员，作为一种职业的工人，只是“做工食饭”，社会政治地位同样是低下，当然极少数的工人政治骨干除外，所以，这些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所谓领导阶级的一般成员也有不少加入“四二二”，并成为了“四二二”的主力。

“四二二”派源于广西首府南宁，发展到全自治区，但这个民间结社，更多的是靠观点认同以维系，而不是象“联指”一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各地“四二二”组织多是各自为战的，没有组织上的统属关系。在1968年中，“四二二”的头头之一、广西医学院学生黄达声曾想建立“野战军”，以组织全自治区“四二二”的有生力量反抗韦国清和“联指”大屠杀，但因组织形式的松散、统一指挥系统的缺乏、没有联络各地的渠道，势单力薄的组织在与强敌进行殊死搏斗中却是表现得相当顽强不屈。

就南宁而言，“四二二”也得到普通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四二二”立足之处就是市民聚居的旧城区，在1968年武斗期间称之为“解放区”，而“联指”则控制了更为广阔的党政机关区。文革期间，一省之首府城区一分为二，楚河汉界，二大派各据一边，这可能也是全国唯广西所特有。究其缘由，这又是与建国后南宁的特殊城市格局有关，南宁的城区一大特点是政府机关区和市民区是泾渭分明的。城东是政府区，马路宽敞笔直、路边绿树林荫，各个政府机关的办公楼与干部宿舍都在高墙环绕的大院内，自成一体，里面大小楼宇映掩在绿树花丛之中，宛如别致优雅的园林庭院。而城西则是民国时期的旧城区，那里的居住环境则是另一番的景象，马路弯曲狭窄，还有不少路面是凹凸不平泥地，到处污水横流，而市民居所多为破旧简陋砖木结构房子，还有不少还是木板房，屋内光线昏暗、空气混浊，且一家独居一屋的甚少，以多个家庭挤迫蜗居于大小不一的杂院之中的居多。这些居住于环境恶劣的“平民区”的市民，除工厂商店的普通职工外，还有小商小贩之类和下层的体力劳动者，如拉木车、赶马车等搬运工和一些靠挑泥方（工地余泥）为生的无固定职业者。广西首府南宁的城市布局以物化的形式，毫不掩饰地显露了以党政官员为主体社会群体所享有的特权，自然引起了长年累月居住于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旧城区的普通平民群体内心的愤愤不平。这些艰难度日的下层市民平时远离政治，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他们对“四二二”的同情和支持，并非出于对文革的热情，仅是一种痛恨社会不公的群体心理的本能反应，所以他们当中多数人都没有直接参加到派组织中来。即使这样，他们却因此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1968年大屠杀中，他们赖以栖身之地遭到“联指”的重炮射击、炸药包轰炸，然后是放火焚烧、泄洪淹没，变成了一片片的断壁残垣废墟。有些无辜的居民惨死于“联指”的狂

轰滥炸之中。当时，参与围攻“解放区”的联指各县民兵中的钦州民兵，他们从援越抗美的部队中学会了用小炸药包送大炸药包的轰炸技术，从1968年6月开始，就经常向“解放区”盲目地发射巨型炸药包，炸死炸伤的几十人之多，且基本都是无辜的居民。当时，我激于义愤，每有炸药包爆炸造成人员伤亡时，当即赶到现场调查登记死伤人员的详细资料，以准备日后向中央控诉。记得当时记录的有关人员伤亡的事件累计有二十多起，其中最惨不忍睹的一起是正在吃饭的一家人被凌空投下的炸药包当场炸死多人，死者当中还有一位孕妇。这些记录“联指”罪行的资料，在我被俘的当天早上塞在路边的瓦砾堆中了。近年，与我学生役人同学谈及当年文革事，才知道当时那一家几口死于非命的原来是他太太黄吉凤家。吉凤写了有关此事的回忆给我，现在全文转录如下，作为真实的历史佐证：

“我于1949年农历正月初八，出生于广西省南宁市邕江河边的一条叫“石巷口”的小巷内，姓黄，取名凤吉，用我母亲的话说是：解放那年出生的。父亲是在解放前从乡下横县来到石巷口这里，在巷口租下一块地，搭了一个木屋（实行地址门牌管理后，被称为：石巷口1号），上面住人，下面作工场，开了一个家庭木工作坊，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石巷口是一条只有3米多宽的小巷，巷内住的大多是象我家一样的普通人家。我母亲除了操持全部的家务外，还常常抽空去巷口邕江边上的，名为民生码头的码头上，为上下船的旅客挑行李，赚取些挑脚费，以补家用。家中的生活，应是较艰苦的。而这石巷口却给我的一生留下了悲欢离合的难以磨灭的记忆。其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发生在1968年6月间的那件事。

1968年6月的南宁，全城被一种莫名的战争恐怖笼罩着。按当时的说法是，支持韦国清的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指”，对支持伍晋南的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422”进行武力围剿。而当时两派分歧的焦点，表面上是集中在支持掌有广西党、政、军实权的韦国清或支持无什么实权的伍晋南的问题上。就是这些问题的分歧，导致了一场血腥的战争。战争之前，“422”占据了南宁市的老城区及老城区内的商业街区，主要为解放路，民生路，兴宁路，当阳街，新华街，高峰路，西关路，布新街，水街，南宁百货大楼，及当阳街至水接的邕江河北岸一带的街区。老城区的主要居民多为平民百姓，我家就在邕江河北岸的石巷口。战争一开始，联指就对422占据区实行了全面严密的封锁，进出422占据区的道路出入口，均设检查岗哨，严查出入人员。后来，就开始响起了零零星星的枪声。住在422占据区的居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照样过着他们的生活，包括我的一家人。不过，就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能躲到那里？我们家的一大家子人，就那么一间，一个人走动，全屋都咿呀作响的木屋。一天早上，从梦中醒来，就听到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大家都知道是422占据区的边缘，又发生战争了，而且不时还听到轰轰的爆炸声，听街坊邻里说是联指开始攻打422占区了，攻打422占区的武装人员不是南宁市的联指人员，而是市郊及邻近几个县的农民民兵，这些民兵，不但有枪，还有炮，有土坦克，还会用小炸药包把大炸药包准确的送到对方阵地去炸对方。但枪声及爆炸声听起来还是离石巷口蛮远，大家除了惶惶恐恐地谈论外，根本不去想这场战争会对街坊邻里的老弱病残及孕妇带来什么危险，只认为是给日常生活上带来许多不便而已，谈论后，还是该干嘛的干嘛去，该煮饭的煮饭去。

中午时分到了，我们一家子九人，围在与街巷只有一木板墙之隔的家里吃饭，此时，外面的枪声炮声时而密集时而稀稀落落，且又时远时近。对这一切，大家似呼是惯了还是麻木了，谁也没有一点表情表露，只是夹菜、吃饭。吃完饭的大哥正和家住对门的一位绰号叫“瘦姨”的阿姨聊家常；一个只有7岁大的外甥就跑到门口去和我家养的一只小狗戏耍。突然一声巨响，只觉一阵气浪猛的推了我一下，我眼前一黑，瞬间昏蒙过去。当我稍有意识时，我的第一本能反应是爬起来向爆炸声源的反方向跑，当我冲出的硝烟，跑进后屋的厨房，再回头看时，硝烟还未散尽。但却可透过朦胧的硝烟，看见人们躺满一地，随着硝烟慢

慢散去，有些人也慢慢的爬了起来，而我已有四个月身孕的大嫂，我外甥的爸爸，还有“瘦姨”是再也起不来了，我大嫂的头被炸破了，任凭我大哥怎样呼唤，她都没有一点儿反应。死去的已经死去了，但活着的人里却未发现我那7岁大的小外甥，大家一面呼唤一面找，才发现小外甥和那小狗已被炸到身首四肢分离，连尸都找不全了。就在我家惊魂未散时对门的两家也分别传来了噩耗，同一颗炸弹（或炸药包）的轰击下，对门的一家死了两姐妹，另一家死了一男主人。到这时，石巷口的居民们才意识到，死亡一直在威胁着他们，此时，他们才相信，联指一方是会将他们作为反对韦国清的人而对他们进行屠杀的。他们觉得好冤。就这事后，他们就这件死了七个人，去了八条命（一个有四个月的腹中生命），还死了一只小狗的事，作了个小结，叫作“七尸八命狗沉冤。”算是对死者的悼念，亦或也算是为石巷口留下一点真实的历史。”

#### （四）

广西“四二二”运动，由其酝酿之始就是处于被打压的劣势之中进行抗争，一直到最后覆亡于血泊之中。究其惨烈结局的缘由，主要的并不在于其派性斗争的对手——广西“联指”人多势众、财力物力之雄厚，而是在于“联指”的总后台韦国清的镇压。

韦国清因曾有功于援越抗法和当时援越抗美的需要，1967年初，周总理让他出任广西军管会主任，当时还广传有关“韦国清是好同志”的伟大领袖最高指示。从此开始，伟大领袖光环罩顶的韦国清在文革乱世十年中，先后出任军管会主任、革筹小组负责人、革委会主任，一人独掌了广西的党政军大权，并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执行者的精神领袖自居，利用“文革思潮”从意识形态上，控制广西强大的派性组织“联指”的广大群众，并建立了一支由联指中嗜血成性的武斗骨干组成的准军事组织，这是一支可不经中央批准由韦国清本人直接指挥调遣的“党卫军”。这个集广西党政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掌控大权于一身的地方极权主义者（土皇帝）韦国清于文革十年中，竭尽全力、不择手段、不惜动用国家最大财力物力去镇压文革的反对派、弱小而宁死不屈的“四二二”，由政治打压到暴力杀戮，用心之狠毒和手段之残忍，远远超出了起码的道德、人性的底线。当时，为群众冲击批斗的各省党政第一把手中，以后对群众进行全省规模长时间的残酷清算的，韦国清是仅有的一个，对他冠之“广西文革屠夫”不为过也，“四二二”运动的成员以及其同情者成千上万之众就是惨死于他的屠刀之下。

还有，“四二二”运动的悲剧还在于，他们误读了伟大领袖有关文革战略思想。伟大领袖让群众起来，大造所谓党内走资派的反，其真实的目的是把党内斗争扩大至全社会，用民粹主义情绪煽动百姓，代他打击党内反对派，其用心借刀杀人而已，丝毫也没有为百姓伸张正义、反对官僚阶层的特权和还民众以公平民主的意图。民众造反替他收拾了党内反对派后，他就回过头来收拾造反的民众。谙熟伟大领袖的文革方略的韦国清，效法当年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的手法，泡制了“反共救国团”和“抢夺援越军用物资”等假案，从伟大领袖手上取得“尚方宝剑”，去剿杀那些天天还在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的“四二二”运动的抗争者。“四二二”中不少死难者临死之时可能还以为自己是捍卫伟大领袖的正义事业而献身的。说到此事，我本人也不例外呀。1968年8月5日，我和同校的吴肯老师与从“解放区”被俘的人群在南宁市市革委会门面等候上车押往收容站时，差点被同校的政治教师、“联指”的武斗指挥官海滨拉出枪杀，当时，我们竟相约临死前要高呼毛主席万岁。如当时我们真的“从容就义”了，便成了受骗上当的冤鬼。

#### （五）

伟大领袖的“文革”被否定了，被视为一场民族的浩劫。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只是一场疯狂的闹剧。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衔，争个你死我活的广西两大派的群众都是这场民族浩劫的受害者。

从文革层面来看，广西两大派都是盲目的领袖迷信和“文革极左思潮”的产物，为此当年的两派派性斗争，今天可以认定，是既无是非之分，也无输赢之别了。

但从社会发展过程的更为广阔历史视野中来看，两大派的内在本质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并大有可以深化研究之余地。

“广西联指”，其精英的组成是从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获取了政治特权和既得利益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他们要保守捍卫的是阶级斗争治国理念之下的社会成员的政治不平等和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封建血统观念。一句话，逆历史潮流而动，即可概括了这个组织的本质了。同时，这个组织又被韦国清用作血洗“四二二”的工具，他们中一些成员本来就是天性凶残的人，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又使这个群众组织沾上了永远洗脱不了的血污，他们当中好些人的人性一时受扭曲，曾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喝彩叫好，这个组织因而充当了冷酷无情的角色。与残酷政治压迫和血腥杀戮的暴行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人多势众、声势浩大的“联指无产阶级运动”，在摧残道德人性、湮灭社会良知方面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当时，南宁相当流行的一句用以诅咒和威吓人的口头禅：“收你米簿”（文革前粮食定量供应，要用粮簿购口粮，“收米簿”，即取你的命也），足说明那时视人命如草芥的邪恶风气之盛，且其流毒遗祸至今不息。

“广西四二二”，则是崛起于社会的下层，其振臂一呼的领头人，有大学生，也有普通工人和机关干部，多是一些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他们为伟大领袖的“四大自由”所激励，不约而同的奋起表达其在阶级身份歧视下被压抑和剥夺的政治、社会权益的诉求。他们反对在阶级斗争的治国理念之下的政治不平等、挑战政治特权阶层的压迫歧视、反击血统论狂热分子血腥暴行，并与一向视“搞运动整人”为“专利”的政治既得利益群体进行实际的对抗。我们知道，建国以来，乐于与人斗的伟大领袖的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强化和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折腾，以及沉渣泛起的封建血统论的猖獗，社会不但被弄得分崩离析、充满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且面临着历史倒退的大灾难。“四二二”运动在客观上是在冲击这种祸国殃民的潮流。文革被否定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被取消，社会终获或多或少的进步。“四二二”运动虽败犹荣，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在和平的年代，为我们国家民族小小的社会进步，竟然要成千上万的民众流血牺牲，付出再沉重不过的代价。这样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古话有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此，为了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去反对和阻挠文革的深入反思和研究，都是千古之罪也。

~~~~~

## 【劫后反思】

梦醒温都尔汗

• 林小仲 •

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夕阳西下，青年点炊烟缕缕，正值农村秋收大忙季节，劳累一天的知青们个个筋疲力尽，整整齐齐靠在炕上的被褥卷上，有人在望着顶棚发呆，有

人在议论着一天里的趣事。混上大队采购，经常到外面出差的白静中突然从外面闯进来，大家都很奇怪，他早上才乘早车去扎兰屯，怎么晚上就赶回来了。

白静中是我们青年点中第一个当大队干部的人，后来离开阿荣旗投奔他在大庆油田的大哥，曾任华北油田计划处处长。他进屋后急忙关上了门，把大家召集到炕桌旁的油灯周围，十分惊愕地说，出大事了，他在扎兰屯听人讲，林副主席乘飞机投奔苏联，飞机爆炸身亡了。这一消息对我们这些从中国政治中心北京来的知青来说，太让人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了。

林彪是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那个年月里，亿万中国人每天都在挥动着《毛主席语录》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毛泽东无比英明伟大，即使是我们响应他的号召，在农村饱尝艰苦磨难时，也对他的政治伟大深信不疑，而这个消息使我们困惑之余惊呆了。

为了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萧庆平赶紧打开了他的七管收音机。那时呼盟与苏联一江之隔，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发展到争夺黑龙江、乌苏里江上一些岛屿的武装冲突，在黑龙江听“莫斯科广播电台”比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清楚。我们这些关心政治变化的知青，常从“敌台”中获取一些消息，知道一些大山外面的事情。大家屏住呼吸听着收音机里“莫斯科广播电台”那熟悉的却又怪腔怪调的汉语广播，播音员果然在反复播送关于林彪事件的报道。因为距离9·13事件发生的时间有一段时间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讲得很具体，而且还有评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彪9·13事件”开始向社会公布，后来中共中央也就此下发了传达文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家仓皇出逃，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三叉戟256号专机爆炸，机毁人亡。

一声震惊亿万狂热投身“文化大革命”人们的思维的巨响，宣布中国现代迷信神话的破产。特别是正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发生了巨大的动摇，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政治上敏感的人开始对“文革”梦反思。

我从小在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中知道一些党史、军史，对林彪更是了解一些，彭德怀、林彪、粟裕、刘伯承、徐向前等人都是指挥过大兵团作战著名的军事家。林彪17岁考入黄埔军校，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20岁参加南昌起义。

林彪24岁时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

林彪30岁时任八路军115师师长，领导了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平型关大捷。

林彪40岁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在1945年至1948年的短短三年中，东北野战军由初到东北时的10万干部战士，发展成百万大军，四野麾下20个军，林彪统帅着130多万人的大军，参加了辽沈大捷，解放平津的两大战役。四野在林彪指挥下，从中国最北方的黑龙江畔一直打到最南方的海南岛。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42岁。

林彪48岁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是十大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位。

林彪1958年51岁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并于1959年9月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

林彪64岁时，1971年9月13日出走，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身亡。

一位战功赫赫的著名军事家，一位党章上规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一位与毛泽东一起在“文革”中受到亿万人民崇拜的伟人，为什么会突然兵戎相见、分道扬镳呢？在传达林彪罪行和他的“571工程纪要”时，我们注意到这个纪要攻击当时的社会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纪要里提到干部去“五七”干校和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前一条提法我们感到茫然，而这后一条与我们这些人命运相干的问题，却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党的副主席林彪外逃事件，对我们这些曾狂热参加“文化大革命”，狂热拥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知青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政治震撼。政治狂热、政治盲从开始从这一代人身上消退，人们逐渐从事件本身，回顾党的历史，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表示怀疑，开始从对毛泽东神一般的崇拜中，恢复到理性思考和判断中来。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寒风拍打着窗纸哗哗作响，村里不时传来犬吠，劳累一天的我们谁也不觉得困，可怜的小油灯的灯油加了一次，又加一次。大家在北大荒的山村里七嘴八舌发表自己的议论，也有的人从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谈了他们的想法。更有人把这种打完天下后，便开始相互争斗残杀，归于中国封建制度影响根深蒂固。他们从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内讧，谈到“文化大革命”内斗自毁长城，但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这群二十几岁的知青解不开的谜。第二天青年点的知青们大都没去上工，村里老乡们搞不清楚青年点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同学中有一位叫萧庆平，他的父母是一对学有所成的年轻专家夫妇，1955年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毅然抛弃了美国优厚的生活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带着幼小的他返回祖国，到水科院工作，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文革”中他父母都受到冲击和迫害。他和我一起到阿荣旗插队，他才思敏捷，温都尔汗的事对他震动很大，他很渴望从深层次上了解这些不可思议的历史事件。萧庆平在粉碎“四人帮”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国际共运专业，一直在那里读完博士。但让人感叹的是，当年他的父母带着年幼的他，从美国返回祖国投身建设。而学有所成的他和他的夫人，一对中共党员，在1987年，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返回了他的出生地美国。我若干年后去美国洛杉矶时，曾去他家拜访。他现在还在工作之余，不遗余力搜集中国“文革”中的各种史料，包括那个时期的首长讲话、大事记、造反派刊物等，他利用假日把它们装订成册，作为他的业余研究项目。他对自己祖国一段深重的苦难历史，认真负责的研究精神很让我感动。我衷心祝愿他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取得成就，把一段他和他的知青同伴们亲身经历的真正“文革”史的评价和分析告诉后人，警示后人。

东北嫩江畔，阿荣旗北京知青茅草屋中的煤油灯，在那个让人震撼的历史关头彻夜未熄。远离北京，远离政治中心的知青们，从“林彪事件”中思考着自己和祖国的未来。

作者简介：林小仲，男，1949年出生于北京。“文革”期间毕业于北京师院附中。1968年9月上山下乡，1977年7月返城，大学毕业于首师大政教系。



□ 摘自林小仲：《知青的岁月》

~~~~~  
【难忘岁月】

恐怖的等待

• 马云龙 •

如果你问我，比“恐怖降临”更恐怖的是什么？那我就告诉你，是“等待恐怖降临”的过程。

对此，我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人们经常把进监狱说成是“下地狱”，可是，在我的体验中，真正的地狱是进监狱前那一个月的日子。

1974年12月2日，是我30周岁的生日。那天，我最要好的朋友和同事，都是一起经过农场劳动、下乡插队的大学毕业生，如今又在长葛县城一个叫做“五七专科学校”的新建学校里当教师，共七八个人，到我家聚会。买了几斤肉，拎来两瓶酒，个个吃得满嘴流油，喝得面红耳赤。一开始，谈话还有个主题，回忆农村生活，分析政治形势，展望将来的出路，后来，就变成了插科打诨说笑话，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狂呼乱叫。最后，看到夜已深了，才摇摇晃晃地散伙了。这个生日过得热闹而又轻松快活。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是那段快乐生活的终结日。

过了两天，当我带着欢乐聚会的余兴到学校去上班时，突然发现周围的气氛变得诡异而神秘了。遇到的每个人，不是调头转弯分路而去，就是低头快步匆匆而过，平时最好的朋友见面也只是微微点头，然后把眼神转向别处。这是怎么了？真是见鬼了。

在厕所里遇到了北京大学毕业的校友翟发祥，他左盼右顾之后才和我说了话。“一句话也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他面目严峻，声音低沉，说完转身离去。

整整一天，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人来访，没有声音，死一样沉寂。这真是反常，平时我这里总是全校最热闹的地方。外面的校园里也是一片寂静，听不到人声，只有呼啸的北风在屋檐上发出凄厉的鬼叫。

下班的时间到了，我走出校门，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终于，有一辆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在我身边停下，是物理教师张凤岐。他匆忙地递给我一张小纸条，然后一句话不说，径直走了。

纸条上写着：“晚八点整在化肥厂后的铁路旁见。”

冬季的晚八点，天已黑透了。化肥厂后的铁路边没有路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正在摸索着，忽然听到脚步声。有两个用帽子和围巾包裹得看不清面目的人走近了，一说话才知道，是张凤岐和数学教师任其亮。

他们带来的消息让我震惊：我的三个同事，数学教师张某，语文教师冯某和生物教师陈某，联名写了封举报信，检举了我的大量“反革命言论”。据说，举报信直送一位中央领导手中，现在，一个由省地县三级公安和宣传部门的几十个人组成的庞大专案组已进驻长葛。这几天正在日夜不停地传讯我周围的人，他们俩已分别被传讯过了。几年后我才知道当时被传讯过的多达几百人。我的同事、朋友、学生和认识的人几乎无一漏网。

传讯中提到哪些问题，这是我所关心的。他们说，到底有多少问题还不知道，但从已提到的问题来看，情况似乎“上纲上线”，相当严重。例如：

我曾经说过，对毛泽东也要“一分为二”，“毛泽东也有错误”——这是专案组重点追问的问题之一，上纲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我听了之后回答：“这个问题不要紧，我相信能解释得清。”我记得很清楚，这是在一次政治学习时发生的争论，有人说“一分为二”的理论不能用在毛泽东身上，他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什么错误，我不同意，因此发了一通议论。我不认为这就是“攻击”。

还有一条是“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我听后又笑了起来——我们那所新建的学校，上马匆忙，设计草率。由于夹在方向并不垂直的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专用线之间，大门是斜的，进门后的路和院墙形成锐角，十分别扭。一次在地里劳动时，有人提议，为了解闷，大家来玩个“顺口溜联句”，一人一句，必须押韵。我就说了第一句：“专科学校，歪门斜道。”大家哈哈一笑，有人接着续下去：“公鸡学着母鸡叫……”这是真实的故事：学校要搞副业，由生物教师陈某（他是农学院兽医专业毕业）牵头养了100只鸡。结果死了99只，只剩下一只公鸡，还整天学着母鸡下蛋咯哒咯哒地乱叫。有人又续了一句：“任其亮学着女人尿……”这是现场发生的实景：当时任其亮要小便，懒得到几百米外的厕所去，又怕远处的女同志看到，于是就地蹲下来在庄稼中方便了……这个“顺口溜”一直续了十几句，当时逗得大家笑成一团，欢乐无比。这本来就是玩笑，也成了“反动言论”了？岂不可笑……但是，在我被捕后接到的起诉书中，还真有这一条。因为那所学校的名字中有“五七”二字，我说的“歪门斜道”就被解释为对神圣的“五七指示”的直接攻击了。

前两条我并不十分在意，觉得可以解释清楚。但后面说的几条让我心里一沉——“攻击江青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我有几次近距离观察江青的机会，感觉总是怪怪的。

一次是1966年7月26日晚，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接见全校学生。当时我坐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地方，第一次见到这位神秘的“第一夫人”。江青在大会上的讲话让我大吃一惊，她突然脱离批判“工作组”的主题，把矛头指向在中文系比我高两个年级的张少华（后来以“邵华”的名字闻名），说张少华和她母亲张文秋都是坏人，她们“霸占”了毛泽东有病的二儿子毛岸青。江青边哭边尖叫着说：“我们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儿媳妇’！”这一幕让在场的上万人都惊呆了。我后来曾在一些朋友中间说起过这件事，并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这哪像个党的领导人啊，简直像个家庭妇女，把婆媳争端拿到大庭广众中哭诉，真有损她自己和毛泽东的形象……

还有一次，1967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庆游行的预备会，我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座位在主席台上江青后面约两米的地方，所以看得十分清楚。全场的人都到齐了，只等江青的到来。她姗姗来迟，落座后接过李讷（北大历史系学生）递来的书包，从中拿出几个药瓶，在桌子上一字摆开。然后，从每个药瓶中分别倒出一些药片，端起茶杯，在聚光灯下，用很夸张的动作，当着全场几千人的面，一仰头把药吃

下……后来，我在和朋友聊天时，多次说起过对这个场景的真实感受：“真不愧是演员出身，好像是在用动作告诉大家：你们看，我是在带病坚持工作啊！”

我没想到，这些在私密场合的谈话竟然都进入了专案组的调查范围。那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江青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正红得发紫。“攻击江青”可是个足以杀头的罪名啊，我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夜黑天寒，又怕被人看见，我们只说了十几分钟，就匆匆散去。这是在我被捕前和同事惟一的一次私下见面。在被捕后的第一次审讯中，这次会面被当成了追问的重点——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在荒凉的旷野和如漆的黑暗中他们是如何实施监视的。

地狱般的日子就此开始了。

明明心里如滚油煎熬，但我还要装出没事一样，早晨起来照常到马路上去跑步，回来照常到院中结冰的水管下去冷水浴，吃了早饭照常去上班，到了办公室虽然没有来说话，但我还要装作备课的样子……

这期间，还有一次照例举行的“政治学习”，但是气氛和往常迥异。全校教师都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发言，所有的人都铁着脸不说话，气氛十分紧张压抑。只有校长兼支部书记周福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政治学习时，我一直主张大家要畅所欲言，不能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但是，说话也要认真严肃，不能随心所欲，信口胡说……”

这些话，像是在指责什么，又像是在辩解什么。他面目憔悴，两眼浮肿，内心似乎十分痛苦。我注意到，在他说话时，大家都没有表情，只有那三个举报者在活跃地互相交换着眼色。后来才知道，头天晚上，他也被传讯了，当时因为替我辩护，他受到了严厉的斥责。过了不久，他被撤职了，这次讲话也被当成“包庇反革命分子”的证据。

单位的气氛是这样，回到家里，我也不敢说话——因为我当时住在妻子的单位县中学里，宿舍是五开间的大教室分隔改造的，房梁以下用土坯隔开，而房梁以上是通透的，河南人叫“透山墙”。我家西邻是检举人之一陈某一家，而东邻是县公安局的政保股长一家，我像“肉夹馍”一样被夹在中间。那个房子一点也不隔音，邻居家筷子掉在地上都听得清清楚楚，说话就像在一个屋里一样，真的是“隔墙有耳”。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凑近妻子耳边，悄悄地把坏消息告诉了她。她吓坏了，但不敢出声，只是无声地落泪。从此，我们家里没有了声音，有事都用纸写，看完了马上就烧掉。

每天早晨离家时，妻子都要久久地站在窗前，直到看不到我的影子。古人有句诗云“上床与衣履相别”，说的是生命无常，谁知睡下还能不能再起来。我这是把每次离家都当成生离死别，谁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回来呢？每天回到家，两人都要长长地出一口气：又熬过了一天！

最难过的是夜里。无眠的长夜似乎长得没有尽头。又不能说话，只得打开灯翻书。但是书上的字在眼睛里跳来跳去，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于是，拿起笔纸来和妻子“笔谈”起来：

“跑吧。”

“往哪里跑？这年头跑到哪里还不是抓回来？再说，监视得这么严，大概出不了县城就抓住了……”

“申诉和解释去。”

“找谁去说？人家没找你，你见了人家怎么说？——人家问你：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消息了？你怎么回答……”

“不知道哪天会抓起来，不知道会关多久……”

经过几夜无声的“长谈”，我对“后事”做了如下安排：

我被捕后，如果长期不能回来了，就请妻子提出离婚——我不能让她和女儿长期生活在“反革命家属”这个可怕的大帽子的阴影下；我自己会尽最大力量为自己辩护，但我也知道，在那时这样做怕是用处不大，如果真的没有希望了，就自我了断。我不能像畜生一样任人宰割或终生在铁窗下消磨。为此，我还让妻子上街买来两片单面剃须刀，分别藏到皮鞋的后跟里，她垂泪无言地按我的要求办了……

床头的马蹄表滴答滴答地响着，一个个长夜就这样过去了。

1975年的元旦到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惨淡的新年。妻子默默地包了几十个饺子，煮熟后，二人相对，无言地吃下。吃完后我跑到屋外，又都吐了。长期的神经紧张和连续的无眠之夜已超出了身体所能耐受的极限，胃里像火一样刺痛……

我开始不断地祈祷：让该来的早日到来吧！

后来，我在牢房里看到过临终的死刑犯，非常理解他们在听到死亡判决后，为何有人会无望地要求“快一点执行吧！”等待死亡是比死亡本身更可怕的折磨。

这一天终于等来了：1975年1月10日上午，我来到学校后，孤零零地僵坐在办公室中。忽然有人叫门，是范副校长。他回避着我的眼睛，说：“你到会议室来一趟。”

我跟着他走进会议室。一进门，就看到里面有四个穿警服的人。一个面孔黧黑的矮胖子厉声宣布：“我们奉命对你实行刑事拘留。”然后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许昌地区公安局的预审科长于某。四年零九天以后，向我宣布释放决定的也是他。

一个高个子警察给我戴上手铐，又用绳索捆住我双臂。我抬头一看，这人我认识：三年前在农村插队时，村里出现了反革命标语“打倒毛泽东，保卫刘少奇”，他曾去破案，还从插队学生中调我去帮助鉴别字迹呢……

被绳索牵着，我走出了会议室。校园里没有一个人，但路过的每个窗户里都有熟悉的面孔在张望。惟一来和我告别的是传达室的老杨头，平时我总好进传达室去和他聊天。当我们一行走过时，他呆立在大门口，轻轻地对我挥了挥手，眼睛里似乎闪动着泪光……

看守所离那所“五七”学校只有三里多路，而我家住的县中在看守所对面，只有几百米远。我被牵着走进看守所大门时，清晰地听到县中的大喇叭响起来：“紧急通知：全体教职员工到会议室集合……”我知道，这个紧急会议肯定和我的事有关。又想到，此刻那边怕是正按照常例在抄家呢……

办完例行的入监手续后，又跨过两道武装警戒的大门，我就进到冰冷的监房里了。

很奇怪，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点也没紧张。铁门关上后，我才觉浑身无力，就席地而卧，几分钟后即进入了梦乡，这是一个来月来第一次如此深沉的睡眠……

□ 原载《南方周末》2012年3月23日

~~~~~

# 【书刊评论】

大力推荐杨继绳先生新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 胡 平 •

继2008年推出两卷本《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后，去年年底，杨继绳先生又推出新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也是两卷本，共32章，90万字，也是由香港的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我以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文革通史。

第一部用中文写的文革通史是高皋与严家其合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于1986年。杨继绳这部文革通史出版于2016年。其间相隔整整30年。杨继绳谦称自己是文革研究的“后学”。正如杨继绳所说：“后学有后学的好处，不需要从零开始，先行者的卓越工作是我的起点。”30年来，有关文革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杨继绳为了写这部文革通史，单单是阅读量之大，就不能不让你佩服；再加上梳理辨析的工夫和贯通理解的眼力，历时十年，独立完成了这部巨著，在文革史的研究与写作上立起了一座里程碑。

读《天地翻覆》，感触很多。这里我只谈一两个问题。

现在，一谈起文革，很多人就说，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但实际上，群众批斗当权派仅仅是文革的一部分，远非文革的全部。在文革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是群众批斗当权派，而是当权派整治群众。杨继绳这本书把这一方面的事情讲得很清楚。他总结道：在文革中，“民整官”的运动（即冲击“走资派”）只有一年多时间，“官整民”的运动持续时间之长、被整人数之多、手段之残酷，远远超过“民整官”的运动。

不错，在文革中，曾经一度，毛泽东竟然号召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但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毛的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只是权谋，毛只是把群众当工具而已，一旦用完就抛弃。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不久，毛泽东随即就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这些运动实际上就是对造反派反攻倒算，秋后算账。尤其是“清查五一六”运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远远超过运动初期“五十天”打的反革命的数目；更讽刺的是，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然后被平反成了造反派头头乃至进入革委会的人，除了中学生造反派之外，几乎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杨继绳进一步指出：“文革以后，主流舆论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这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就文革中大量死人这个突出问题上，绝大多数受害者，不是死在造反派得势的时候，而是死在镇压造反派的过程中和军政官僚控制的‘新秩序’下，死于专政机器对普通群众有组织的大规模虐杀。‘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镇压他们的人更野蛮，在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只有两年，而造反派被整却长达八年，文革以后还遭到更加

残酷的整肃。造反派的受难人数和程度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造反派是文革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是文革的牺牲品。”

国人讨论问题时，常常不注意区分“事实”与“观点”。杨继绳并不赞同造反派。他对造反派有很严厉的批评。对造反派应当作何评价，这是一个“观点”的问题。造反派受打压的程度更深，时间更长，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现在有一些“毛左”，至今仍对毛的文革赞扬不已，在他们那里，文革就是毛泽东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走资派）。且不说毛泽东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走资派）对不对，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把文革归结为毛泽东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的说法是不是符合事实？杨继绳的书用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群众造反诚然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但也是毛泽东镇压下去的。毛左谈文革，只讲前一段不讲后一段，因此是站不住脚的。

在《导论》里，杨继绳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说：“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烂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能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

对于这个观点，我有些异议。我以为，杨继绳未免夸大了毛泽东和官僚集团的矛盾。在更大程度上，毛和官僚集团是一体的。毛并未打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毛时代的中国，即是高度的党国一体，党政合一，因此我们可以用党来当作国家机器或官僚集团的同义词或曰党天下。我们知道，在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时，张春桥曾提议把造反夺权而成立的领导机构叫做公社，毛泽东没同意。毛泽东说：“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可见，即便在造反夺权的高潮期，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满天飞，在各级党委都在被炮轰火烧之际，毛泽东尚且都没打算放弃党，没打算放弃党的核心地位，没打算改变党天下，何况其他时候。

□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01期，2017年1月20日—2月2日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